

北京考古工作报告

(2000—2009)

宋大川 主编

亦 庄 卷 董育纲 刘乃涛 执笔

K872.105

20121

12

北京文物与考古系列丛书

北京考古工作报告

(2000—2009)

主 编 宋大川

副主编 朱志刚

亦 庄 卷

董育纲 刘乃涛 执笔



上海古籍出版社

序

迈入新世纪之后这最初的十年,是北京市城市建设大发展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高举《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大旗,严肃认真地贯彻、实践,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城市建设中的考古工作中去,为文物保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推进了北京市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成绩举世瞩目。这次出版的这十年建设项目施工前的考古工作报告,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这十年中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设项目施工前的考古工作,或称考古调查与勘探,以往相关单位均做过这项工作,但是否全都认真地形成了报告,我不得而知;即使是形成了报告,是否作为档案保存了下来,我也不得而知。有一点我却是知道的,即这类报告全未公开发表过。因此,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将这十年建设项目施工前的考古工作报告汇集成书正式出版,给人新鲜的感觉,这是公开立档存照,当是一个重要的创举。这项公开立档存照创举的重要意义是让当今和今后关注文物保护的公众获得评议的机会,以与此后的考古工作对照着检验建设项目施工前所进行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的水平,检验建设项目施工前或施工中所做的文物保护或考古工作是否做到了位。这即是接受公众的检验。同时,就业内人士来说,可据此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提高业务水平,推进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已破冰启航,大家紧紧跟上,这条新的航路就可以开出来了。

是以为序。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日 小石桥

前 言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也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和古都,有着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八百多年的建都史,曾为辽、金、元、明、清五朝帝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从此成为新中国的首都。作为世界上伟大的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的发展与保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2000年以来,随着新千年的开始,北京的城市基本建设飞速发展,配合城市建设的考古工作也全面展开。在新的形势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不仅注重考古发掘,更注重科学研究和对文物的保护工作,同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组织科研人员认真编写考古发掘报告,把田野考古、文物保护与科学研究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使北京的考古工作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十年来,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高度重视地下文物保护工作,北京市文物局及市属各委、办、局通力协作,积极支持考古发掘工作,各建设单位对地下文物保护工作的观念和理解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从2000年到2009年的十年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为配合城市各类工程建设,共完成考古勘探总面积两千多万平方米,完成发掘工作总面积二十多万平方米,发掘古代墓葬六千余座,清理建筑基址及其他古代遗迹三百余项。

新千年的头十年,北京市的地下文物保护工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开创了北京考古工作的新局面。总结这十年的工作成果,我们编撰了《北京考古工作报告》,分十六个区县,共十二卷。这部大书虽然只记载了十年来北京地下文物保护的部分工作,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考古工作者在北京的田野山林中与古人对话,与冰冷的石器、铜器、陶瓷对话,他们用自身的智慧和勤奋,去书写北京的历史发展进程。十年间,考古工作者的足迹遍及北京的每个角落,他们勇于实践,上下求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些考古成果如今已成为北京珍贵文明的片段,成为解读北京历史的钥匙。

新世纪最初的十年,不过是人类历史的弹指一挥间,也不过是自然历史的一瞬间。然而,十年来,北京考古工作者紧紧抓住时代机遇,在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中,竭尽全力去保护地下文物,创造了许多令世人赞叹的奇迹。他们不断在探索中奋勇前行,不断在收获中走向成熟,为解读和重构北京的历史和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十年来,他们所经历的艰辛的文物考古工作,见证了北京城市的建设发展,也见证了北京文物考古事业的成长和繁荣。这部《北京考古工作报告》的出版,让我们如同身临田野考古现场,又如同穿越深邃的历史时空,去聆听古人的声音、体味古人的生活。从周口店猿人的凿辟鸿蒙到东胡林人的人文初开,从燕国初封到汉代方国,从盛唐的

边疆重镇到辽金北方的金戈铁马,从元大都的万国瞩目到明清的落日辉煌,考古工作者所发现的每段历史,都有着不同寻常的历程。北京的考古工作,就像一座历史的桥梁,把北京的过去和未来融为一体。

一、保护地下文物刻不容缓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和标志。北京的地下文化遗存,就像无字的史书和档案,记录着北京城市的历史岁月。北京提出要建设世界城市,并作为今后发展奋斗的目标。我们认为,保护首都地下文化遗产,是建设世界城市的必要条件。但是,知易行难。随着北京城市的高速发展,北京的地下文物保护长期处于不良状态,遭破坏情况十分严重。房地产开发、大型建设项目使地下文物保护遭到破坏的问题更加突出。据北京市政协统计,2007年到2008年,北京市新开工建设项目共有4191项,但只有97个项目进行了考古勘探调查,仅占总数的2.3%,将近98%的建设项目未做考古勘探工作。这些数字触目惊心,但却是仅知而已。全市大量未做地下文物保护的建设项目中,究竟损失了多少重要文物,已经无法估算。

十年来,北京市的城市建设进入空前高涨的时期,其建设规模、涉及范围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地下文物保护工作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仅城区危改一项,涉及的地下文物遗址就有战国至汉代的蓟城、唐辽时期的幽州城、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等。其中相当一部分遗址,在危改工作结束后,将荡然无存。

北京的历史文化延续未曾间断,这在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首都中仅此一例。历史变迁中,曾经盛极一时的文化湮没于地下,成为地下遗存。同已获保护共识的地上文物相比,尽管其年代、价值往往超出百倍,但因看不见、摸不着,惨遭破坏的事情时有发生。城市建设中的地下文物保护状况,不容乐观。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给北京的地下文化遗产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破坏。在许多未做地下文物保护的工地,许多古代文化遗产在大型机械的轰鸣中灰飞烟灭。我们认为,地下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不应该有矛盾,而应是城市建设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在现实中往往发生矛盾,似乎要建设就不能太多顾及文物保护,要保护好像就会影响城市建设。在更多的情况下,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被人们所忽视,甚至被视作城市发展建设的一种障碍、负担和包袱。城市建设往往以牺牲历史文化遗存为代价。如北京南站,这座亚洲最大的火车站,建国以后,在它周围发现过大量从汉代到明清的古墓葬。专家认为,这意味着该地肯定有丰富的地下文化遗存。如果在建设之前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这些遗存就会得到保护,遗憾的是没有做。机场三号航站楼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航站楼。加上空港物流园区,以及辐射的道路,占地面积巨大。这些区域,建国以来考古调查表明,有从汉代到明清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考古勘查必有所获,遗憾的是,也没有做任何地下文物保护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应当由建设单位报请文物部门事先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调查、勘探。但是,对于什么是大型,却没有明确的量化规定,造成执行困难。北京市先后分七批公布了326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先后划定了245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已经分三批公布了地下文物的埋藏区域。现在

已划定第四批地下文物埋藏区,涉及15个区县共21项。但是根据现有规定,埋藏区以外及城区一万平方米以下建设项目的地下文物保护,仍处于无法可依的空白状态。此外,相关法规中,虽然要求建设单位依法报请文物勘探,在施工中发现文物停工报告,但对不履行规定的行为却缺乏监督、执法以及处罚的约束性规定。

北京的建设项目,文物部门参与考古勘探的比例并不乐观,大量的建设项目文物部门参与的只占少数,而且其中只有极少数是施工前主动向文物部门征求意见的,其他都是文物部门根据线索,自己找建设单位宣传文物法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规定,在旧城区进行建设占地一万平方米以上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报请市文物行政部门组织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2004年以后,北京二环内超过1万平方米的工程经过正式报批发掘的工程仅12项,其中有11项还是群众举报,只有东城区玉河保护工程是主动征求文物部门意见的,因为该项目本身就是文保项目。对于地下文物,由于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很容易造成重地上、轻地下的文物保护现状。改革开放以来,富足的北京市民已然能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达成共识,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现行的法律不足以约束工程建设者对地下文物的破坏。

地下文物对于北京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是一个长期发现积累和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地下文物,就如同是一部巨大的地下史书,等待着我们去寻找、去发掘、去梳理、去研究。北京有多少地下文物埋藏,就可能有多少历史再现;北京有多少地下文物被科学发掘出土,就可能有多少历史被续写。地下文物的保护确有较大难度,因为地下文物的埋藏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未知性,它不完全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内,保护目标不可能像地上文物那样明确。究竟什么地方有地下文物埋藏,有些知道,有些能够预测,有些则完全不知道。地下文物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又有非常脆弱的一面,因为任何一种破土施工行为,都有可能遇到地下文物。如果在已知或可能有文物埋藏的地点破土施工而没有事先的勘探发掘,如果在未知地点破土施工,而没有事先的调查勘探,如果在破土施工当中遇有地下文物露头而不能保护现场并及时报告文物部门进行抢救性发掘,凡此种情况都会造成对地下文物的毁灭性的破坏。

北京的现代化都市是在古代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遗留着大量反映城市历史的文化遗存,它们或是古代建筑,或是地下文物,甚至是历史上的街区布局。历史文化遗存是一种资源。保护好它,进而利用它,对推动城市的旅游事业以及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深化会越来越明显。

十年来,伴随着申办和举办北京奥运会的过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着严峻形势,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为了尽快把北京建成世界型城市,以大型市政建设、交通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模式为主的旧城改造全面展开。为了加快改善北京旧城内居民的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北京房地产开发热潮迅速深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区,大规模改造客观上给北京旧城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在城市基本建设大发展的同时,北京古代文化遗产的保护遇到了严峻挑战。做好地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如何在北京市的城市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有效地保护城市原有的古代文化遗产,并合理利用这些古代文化遗产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服务,是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在城市建设迅速向现代化迈进的今天,如何处理好城市建设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是摆在许多城市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一个罕见文物古迹的城市是缺乏历史厚重感和深厚文化底蕴的,而一个富含文物古迹的城市却因保护不善使文物屡遭破坏是令人心痛和遗憾的。北京古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好坏,不仅在全国有表率示范作用,而且为全世界所瞩目。北京市的城市建设在突飞猛进地发展,日新月异的北京将以什么样的面貌展现给世界,是一个风格趋同似曾相识的北京,还是一个独具中华传统文化神韵的北京,答案不言自明。

二、北京地下文物保护的新成就

十年来,北京的考古工作者在艰难的条件下,从不足3%的城市建设项目中,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些被保护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城市的历史信息,是城市的历史记忆。可以说,它是北京的文脉和灵魂,起着标识城市历史、诠释城市发展进程的作用。考古工作者为正在建设世界城市的北京,留住了一些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灵魂。

1. 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地下文物保护

北京奥运会场馆建设是奥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市秉承人文奥运理念,严格执行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在奥运场馆建设之前,首先进行文物保护工作,着力保护古都历史风貌和文化遗产。奥运场馆工程分布在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18个奥运场馆及配套工程进行了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勘探面积1580000平方米,发掘面积9787平方米,保护了汉、唐、辽、金、明、清等各个时期古代墓葬700余座,出土了金器、银器、铜器、玉器、瓷器、陶器等大量珍贵历史文物1500余件,圆满完成了北京奥运场馆地下文物保护工作,为保障奥运场馆建设的顺利进行作出了积极贡献,深刻诠释了人文奥运的理念。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北京段文物保护工作是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物保护工作的完成,对于抢救保护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顺利实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南水北调工程北京段全长80公里,经房山、丰台和海淀三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完成输水管线范围272万平方米的沿线勘探,并在此基础上保护了8处地点、总面积16360平方米的古迹遗存。保护汉、唐、辽、明、清等时代的古代墓葬120多座,窑址15处,铜器、玉器、瓷器、陶器等各类文物2000余件。其中丁家洼遗址、南正遗址和岩上墓葬区是南水北调北京段文物保护的重点,是研究北京西南地区春秋至东汉晚期非常重要的考古学资料。

2. 轨道交通建设的地下文物保护

为配合地铁车站的施工建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地铁四号线圆明园站正觉寺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为240平方米,发现清代三合土路基1条,正觉寺山门前甬路1条,房址1处,水道2条。圆明园地铁站为地铁四号线的丙级车站,车站总长184米,基坑深度18米。车站位于正觉寺山门前南侧,清华西路正中,万泉河的北岸。路基位于正觉寺南,东西向,主体为三合土夯土,土质坚硬,夯土内浇灌糯米糊,底部基础部分打柏木桩加固。甬路位于正觉寺山门正南,属于正

觉寺的中轴线。房址位于发掘区东北部,正觉寺八字墙东南端,长方形,坐北向南,东西面阔两间。水道发现两条,底部用石条,两侧砌青砖,上用条石封盖,北端与正觉寺东南角水道相通,南通向万泉河。地铁四号线圆明园站发现的東西向石条铺路,规模大,规格高,是清盛世圆明园外围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它与圆明园内及外围水道、陆道联成一体。其结构和位置充分反映了它在圆明园中的重要性,是研究清代道桥结构的重要实物资料。

京沪高速铁路北京段总长约36公里,铁路自北京南站西端引出,经丰台、大兴后进入河北省廊坊市。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开展了沿线文物调查勘探工作。在此基础上,在大兴区西红门镇清理了明代窑址1座,在安定镇清理了辽代砖室墓葬2座。发掘的辽代砖室墓大致呈南北方向,均没有被盗,两座墓葬的形制、规格相近。墓室的顶部为圆形穹隆顶,底部作正方形。墓室中部置棺床,墓壁上砌有仿木结构一斗三升的斗拱、椽头、瓦槽、桌、椅、直棂窗,抱厦、立柱及柱础等十分精美,栩栩如生。在仿木构的部位用红、黑、白颜料进行了描绘。棺床上部发现木函残片,但大部分已朽。出土白瓷碟、碗、罐、嘉祐通宝等各类文物约20件。从墓葬的形制、出土物的时代特征看,这两座墓葬应为辽代晚期的家族墓。其中在墓壁上集中抱厦、对称直棂窗、桌、椅等仿木构雕砖在北京地区十分少见,为了解当时的建筑形制、民俗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为配合轨道交通房山线车辆基地工程建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该工程征地范围内发现的古代墓葬和遗存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地点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东阎村,东南距黑谷台遗址约3公里。发掘面积1700平方米,发掘战国晚期灰坑2座,明清墓葬66座。灰坑中所出土陶器以灰褐陶和红褐陶为主,皆以云母为羼和料,具有战国晚期燕国陶器的特征。陶器可辨器形有陶豆、陶釜、陶盆、陶罐等,建筑材料有瓦当、筒瓦、板瓦等。

3. 城市道路改扩建工程的地下文物保护

为配合京平高速公路工程建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京平高速7标段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地点位于平谷区马坊镇河北村西。发掘清理元代墓葬5座,明清墓葬18座。元代墓葬均为砖筑的圆形单室墓,墓道均朝南,墓顶部均已坍塌,有三座火葬墓,两座合葬墓。出土了一批瓷器,有钧釉碗、青釉盘、白地黑花碗、四系瓶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生活情况。所发现的明清墓葬与北京其他地区的墓葬区别不大,多以双人合葬为主,陪葬器物有铜钱、簪子、陶罐等,为北京地区的明清墓研究提供了资料。

为配合西六环路建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西六环3标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地点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大苑村村西,发掘面积共计5000平方米。发掘清代寺庙遗址1处。遗址南北长约160米,东西宽约50米,共发现寺庙内有建筑43间。基本可以判断寺庙的布局,由南向北分布着钟楼、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毗卢殿、后院等。在寺庙遗址出土有佛字纹瓦当、海马等建筑构件。发掘汉墓1座。为甲字形砖室墓,出土器物有陶罐。明清墓36座,以双棺墓为主,墓葬分布相对集中,可能为家族墓。出土随葬品有青花瓷碗、瓷罐、铜簪、康熙通宝等。

为配合京承高速公路三期工程建设施工的顺利进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位于密云县松树峪村东部京承高速公路沿线的明清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的墓葬分东西两区,东区发掘墓葬7座,西区发掘墓葬97座,发掘总面积约为1700平方米。墓葬分布比较集中,排列也较

为整齐,应分属两个家族墓地。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分合葬与单人葬两类。合葬墓大多为双棺合葬,少数为单棺合葬、三棺合葬。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少数为侧身屈肢。单人葬大多为仰身直肢葬,少数为火葬墓。墓主头下多置青瓦数层,有的腹部也压有青瓦。墓葬内出土陶罐、陶钵、瓷罐、瓷壶、瓷碗、铜钱、铁犁、镇墓瓦、镇墓石等随葬品。松树峪明清墓葬的发掘,对研究明清时期本地区的丧葬习俗与民间宗教信仰提供了重要资料。

4. 商品房、经适房、两限房建设的文物保护

配合武夷花园二期项目工程建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该工程占地范围进行了考古发掘。武夷花园二期项目位于通州区潞城镇,东至六环路,南邻通胡大街,西至武夷花园紫荆园,北邻运河减河。发掘面积为1500平方米,清理汉代墓葬11座,窑址1座,辽金时期水井2眼,清代墓葬2座。出土的器物有陶器、瓷器、银器、铜器、铁器等,共90余件。此次发掘清理,对了解本地区古代历史及其社会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研究北京地区两汉、清代墓葬的形制特点、丧葬习俗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为配合石景山鲁谷万达广场的工程建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该工程占地范围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墓葬62座,其中有10座为金代的竖穴土圻石槨墓,墓向为东西方向。根据墓葬区内出土的四合墓志的记载,并结合辽金时期的史料,确认金代墓葬为辽金时期幽燕地区汉人世家大族吕氏家族的家族墓。此外,还出土了7件精美的瓷器,有越窑的八棱双系瓶、定窑的双系罐等。此处墓地的发现为了解、研究北京地区辽金时期的社会、政治、习俗等方面的情况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为配合丰台区王佐银河星座居住小区住宅工程建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该工程占地范围进行了考古发掘。王佐遗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部,此次发掘根据遗迹的分布情况将发掘区分为三个区。发掘的总面积为2600平方米。共清理汉、隋唐、辽、清诸时期墓葬80座,窑址8座。出土的器物有瓷器、金器、银器、铜器、玉器、陶器等,共计350余件。从王佐遗址清理的墓葬和窑址来看,时间跨度大,内涵较为丰富。说明了该地区在古代居民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该遗址的发掘清理,为研究北京地区汉至清诸时期墓葬的形制结构、文化内涵及古代窑址的生产模式提供了珍贵的考古资料。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大兴新城北区十六号地进行了发掘。发掘地点位于大兴区黄村镇北程庄村。此次发掘清理北魏墓葬1座、唐代墓葬5座、辽代墓葬12座、金代墓葬14座、清代墓葬16座。出土器物主要有铜器、瓷器、陶器等,种类丰富,如铜簪、鎏金铜耳环、白瓷碗、白瓷盘、白瓷盏、白瓷盏托、青瓷盏、陶罐、陶盆、陶碗、角把杯、陶钵、陶执壶、陶鼎、陶三足盘、陶剪刀、陶簸箕、陶熨斗、陶水桶、铜钱等。辽代墓葬均为带有墓道圆形穹隆顶砖室墓,墓门为砖砌的仿木结构,上施彩绘,个别在墓室内有壁画,室内往往还有砖雕的灯台、桌子、椅子、门等。这批墓葬的发现对研究北魏至清代时期大兴地区居民生活状况、丧葬习俗、经济状况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为配合大兴区康庄项目两限房工程建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该工程占地范围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一处辽金时代塔林遗址,共发掘塔基25座。塔林遗址位于大兴区黄村镇西北部,西距永定河5公里,地势平坦。塔林遗址内发现的25座塔的基础部分保存较完整,形状可分为长方

形、六边形、圆形三类。有 19 座在塔基前发现有踏步,根据塔基前的踏步可知塔基坐北朝南。塔基下方为地宫基槽,内置木函,木函有的已朽,有的保存完好。木函内放置有骨殖,在骨殖下铺有一层铜钱,大多数在木函内还放置有鹅卵石。出土器物主要有香炉、白釉杯、黑釉茶盏、白釉印花瓷碟、白釉长颈瓶、石菩萨像、铜菩萨像、舍利盒、陶罐等。经幢上的题刻为汉文和梵文,内容是《佛顶尊胜陀罗尼》和尼姑的生平事迹。经幢题记所载的持净院应为塔林遗址所属的寺院名称,持净院及其塔林的存续时间超过百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发掘的多为大型塔基,而此次发掘的辽金时代塔林遗址以中小型塔基为主,数量较多,这为中国佛教考古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塔林内发掘出土的经幢的题记,对于研究北京建都史、辽金时期的佛教文化以及北京地区历史地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大兴区黄村镇高米店西部的新城北区十三号地块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唐代墓葬 7 座,明清墓葬 61 座,唐代灰坑 1 座。出土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等各类文物 90 余件,种类丰富,器形多样,具有重要的科学、历史、艺术价值。

为配合延庆西屯土地一级开发,对工程占地范围内的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 35 130 平方米。延庆西屯墓地位于延庆县延庆镇西屯村西南约 200 米,该墓地北靠燕山余脉冠帽山,南邻妫水河,以欢呼路为界,分为 I 区和 II 区。共发掘墓葬 490 座,年代早至战国时期,历经汉代、魏晋时期、唐代、辽代直至明清时期,出土遗物共计约 2 000 余件。该墓地涵盖内容丰富,出土了大量有意义的陶器、铜器以及少量的金器、铁器等,尤其是出土了年代较为确切的汉代铜镜和北魏神龟元年墓志砖,为大批汉墓和魏晋时期墓葬的年代判断提供了有力依据,对于北京地区汉代至魏晋时期墓葬年代序列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配合房山区窦店聚豪苑四期工程建设,对工程占地范围内的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房山窦店汉墓位于房山区东南部窦店镇,此次发掘的总面积为 1 200 平方米,共清理汉代墓葬 31 座,出土的随葬器物有陶、银、铜、铁器等,共计 200 余件。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器类有罐、壶、盆、灶、釜、奩、器盖、耳杯、楼、井、人物俑及动物俑等,铜器有镜、带钩、环、铜钱等。窦店地处永定河及大石河之间的冲积平原,在汉代属良乡侯国管辖范围,此前的考古调查曾在其西侧发现汉代的古城遗址,有研究者推断为汉良乡故城,距此次发掘汉墓的区域较近。因此,窦店汉墓的发掘清理,不仅为北京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增添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为寻找汉良乡故城遗址提供了重要线索。

5. 大型工程建设的地下文物保护

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朝阳区、通州区、大兴区三区交界处,为配合开发区的建设,对地下文物进行保护,共清理各时期的古代墓葬 500 余座,窑址近 10 座,出土铜器、铁器、陶器、瓷器等文物近千件。古代墓葬的时代历经汉、唐、辽、金、明、清等。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地下文物保护,有力地支持了施工建设,为北京地区考古研究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配合陕京二线输气管道建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总勘探面积为 170 000 平方米,探出古代墓葬 27 座,古窑址 1 处,并在此基础上清理出一批有价值文物。

华能热电厂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为配合厂房建设两度发掘,共清理墓葬 23 座,其中

金代墓葬1座,明代墓葬6座。出土遗物有玉带、铜镜、瓷碟、墓志、金饰以及铜钱、簪子等。该墓地重要收获是发现了5座明代家族墓。根据墓志记载,这5座墓葬均属明代怀柔伯施氏家族墓,以第一代怀柔伯施聚为中心,其子孙呈“人”字形葬在他左右。这种聚族而葬且长幼排列有序的葬式,与史书记载的昭穆制度相吻合。如此典型且等级又高的明代家族墓地,在北京明代考古发现中尚属首见。

为配合平谷兴谷开发区的施工建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兴谷开发区杜辛庄村东北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杜辛庄遗址共发掘汉代墓葬17座,汉代窑炉12座,明清墓葬12座,出土铜器、陶器、瓷器等各类文物110余件。

为配合延庆县南菜园小区建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该工地进行了考古发掘。该地块位于延庆镇南辛堡村东,为妫水河南岸阶地。共清理汉、唐、元、明、清等各时期不同类型墓葬290座,共出土各类文物约870件,且有较高的文物考古价值。汉代墓葬共清理约20座,均为砖室墓。按墓葬形制分为单室、双室、多室。其中,数座五墓室、七墓室的墓葬在北京是较少发现的。出土的文物有陶、铜、铅器等。以陶器为大宗,器形主要有罐、壶、灶、仓、俑等。铜器则有带钩、镜等,并出有大量的五铢铜钱。唐代墓葬共清理40余座,按墓室平面形制可分为圆形、方形、方形圆角等几类。墓顶均已坍塌,据残余部分推测原应为穹隆顶。墓葬的棺床有直尺、折尺形两种。唐代墓葬虽均经盗掘,仍残出有陶器、彩绘陶器、瓷器、三彩瓷器、瑞兽葡萄铜镜等遗物。其中,一座墓葬中出有唐开元年间明确纪年的墓志。延庆地区发现唐代早期墓葬是较为少见的,因此弥足珍贵。部分墓葬砖雕仿木构的直窗棂、门扇、柱础、斗拱、灯檠等均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门簪、刻锁门扉等十分精彩。一座墓葬还残有古代仕女的彩绘壁画。元代墓葬出土钧釉瓷碗、磁州窑罐、香炉等瓷器十分精美,填补了该地区此类物品的空白。明、清代墓葬共清理190余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单棺、双棺、三棺三种形制。葬式为仰身直肢,墓主人胸口多覆有板瓦,有的还以朱砂录文。随葬器有陶罐、瓷钵、铜簪、镂空玉佩、银耳环、铜烟袋锅、铜钱等,为了解当时的民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南菜园古代墓葬,跨越了汉、唐、元、明、清等几个主要时期,尤以汉、唐时期为多,是北京地区近年来发掘墓葬数量最多的一次,从而证实了千年来妫河流域就是适于人类生息的场所。唐代墓葬中众多的砖雕仿木构为研究当时的墓葬形制、建筑形制提供了可类比的翔实资料。延庆县位于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的交通要冲,在中国文明缔造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此次南菜园墓葬的发掘,对了解民族间的迁徙、融合、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配合中国航天三院的施工建设,对云岗地区发现的两座辽代墓葬进行了发掘。由出土的墓志得知,此处为辽代高官刘六符及夫人的合葬墓。墓中出土了瓷器、铜器、陶器等,对研究辽代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为配合密云县第七中学等工程建设,对位于密云县城区西北大唐庄村北部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唐代墓葬4座,辽金时期墓葬24座,元代墓葬28座,清代墓葬1座。出土各类文物90余件,包括铜器、陶器、瓷器、玉石器等,种类丰富,器形多样,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6. 北京旧城内的地下文物保护

毛家湾瓷器坑位于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院内,该瓷器坑系人工挖掘而成,坑口距地表1.4米,

长7.8米,宽5.2米,略呈不规则长方形。瓷片平均堆积厚度为2米,堆积较为凌乱,垂直方向及水平方向上不同位置的堆积,没有早晚层位关系。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瓷片的年代特征判断,该瓷器坑形成于明代正德、嘉靖之际。坑内出土瓷片逾百万余件,数量巨大。其时代自隋唐直至明中期,以明中期景德镇青花瓷片为大宗。出土瓷片涉及景德镇窑、龙泉窑、钧窑、磁州窑等多个窑系,绝大部分是民窑产品,仅有个别出自官窑。普遍带有摩擦、磕碰、铜补等使用痕迹。毛家湾出土瓷片数量特别巨大、窑口众多、器形丰富、釉彩品种繁多、纹饰题材异常丰富。基本汇集了元、明两代主要窑口的瓷器品种,涵盖了日用瓷、陈设瓷、建筑用瓷等范畴,为研究元、明瓷器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材料,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大吉片危改区位于宣武区菜市口东南,北起骡马市大街,南至南横东街,西起菜市口大街,东至高家寨胡同,占地面积43万余平方米。该范围长期是北京市城市建设的中心地带,历史文化遗存丰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制定了详细的地下文物保护工作计划,分调查、勘探、发掘三个阶段进行。摸清了该区域地下遗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埋藏概况,对发现的部分遗迹进行了试掘。两次试掘面积共计140平方米,发现唐代灰坑、辽金时期的水井、灶坑、房址等遗迹多处,出土陶罐、三彩饰件、瓦当、铜钱等数十件遗物。这两次发掘,初步探明该地段文化层堆积情况,确认了少量金代遗迹,尤其是灶坑的发现,对灶炕的起源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唐代地层及汉晋遗物的发现,为探寻蓟城的具体位置具有一定研究价值。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万宁桥和地安门东大街之间的玉河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考古发掘共清理出元代通惠河堤岸、明代玉河堤岸及其河道、清代玉河堤岸及其河道、东不压桥及澄清中闸遗址、两座便桥遗址、玉河庵遗址、码头遗址及排水道等重要遗迹,出土了玉河庵碑、银锭锁、瓦当及一批陶、瓷器等文物。

故宫文物保护中心遗址位于故宫长庚门段筒子河西侧,南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西以紫禁城西墙为界,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为配合该工程的建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发掘面积6500平方米。揭露出16处建筑基址、4眼水井、32个灶、96个灰坑,以及2条排水沟等遗迹。出土一批陶、瓷、琉璃、石、铜、玉、骨等质地文物,以瓷器和琉璃构件数量最多,绝大部分已残损。此次发掘,基本明确了明清时期该遗址房屋建筑的布局、规格以及用途,也基本究明了三组不同时代房屋建筑的兴废变迁过程。遗址出土的瓷片和琉璃构件、戳印铭文的砖瓦对探讨明清宫廷用瓷制度、琉璃窑和砖瓦窑的生产组织等情况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三、科学研究,成果斐然

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物考古事业得到蓬勃发展。在北京市委、市政府以及市文物局的关心支持下,北京的文物保护工作有了长足的进展。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综合国力的提升及大型基本建设的开展,北京地区的文物保护事业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点到面、从部门行为到社会行为的根本性转变,考古队伍也在事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壮大,工作能力和研究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全体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之下,学术研究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大量资

料的整理与研究,为北京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资料。十年来,围绕北京地区考古发掘与研究,先后完成学术专著、研究文集、考古发掘报告等50余部,在《考古学报》、《考古》、《文物》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余篇。

学术专著主要包括:《北京考古发现与研究(1949—2009)》(上、下册)、《清代园寝制度研究》(上、下册)、《清代园寝志》、《瀛寰志略校注》、《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上、下册)、《北京文物地图集》(上、下册)、《北方幽燕文化研究》、《北京地区辽金墓葬壁画保护研究》、《北京文物保护报告》、《金代陵寝宗庙制度史料》等。

专题报告有《北京历史文化论丛》第一辑、《北京历史文化论丛》第二辑、《北京历史文化论丛》第三辑、《北京历史文化论丛》第四辑、《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五辑、《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六辑、《流逝的风情》、《燕秦文化研究》、《北京考古》第一辑、《北京考古》第二辑、《北京出土文物》、《北京奥运场馆出土文物》、《盛世调吉水,古都遗博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北京段出土文物)》、《毛家湾出土瓷器》、《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青铜卷》等。

发掘报告主要有《北京金代皇陵》、《北京龙泉务窑发掘报告》、《北京龙泉务辽金墓葬发掘报告》、《毛家湾明代瓷器坑发掘报告》、《昌平张营(燕山南麓地区早期青铜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圆明园长春园含经堂遗址发掘报告》、《北京亦庄考古发掘报告》、《北京工商大学明代太监墓发掘报告》、《圆明园长春园宫门区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玉河2007年度考古发掘报告》、《军都山墓地:玉皇庙》四卷、《军都山墓地:葫芦沟与西梁垆》二卷、《北京奥运场馆发掘报告》、《北京皇家建筑遗址发掘报告》、《北京寺庙宫观考古发掘报告》、《鲁谷金代吕氏家族墓葬发掘报告》、《平谷杜辛庄遗址》、《丰台王佐遗址》、《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文物保护项目:北京段考古发掘报告集》、《房山南正遗址:拒马河流域战国以降时期遗址发掘报告》、《大兴北程庄墓地》、《密云大唐庄》、《城市记忆:北京地下文物保护》(2005—2009)等。

《北京考古工作报告》的出版,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集体智慧的结晶。十年来,北京的考古事业蓬勃向上,飞速发展,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为北京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有的考古发现被列为全国重要考古发现。十年来,北京文物研究所对出土文物进行了科学保护,在墓室壁画、土遗址、纺织品、漆木器、金属器物等保护方面做了重要工作,特别是在墓葬壁画的科学保护上有突出的成绩。十年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出版了大量的学术研究著作,近几年以每年十余部的数量出版考古发掘报告和学术专著,在考古学界赢得了好评。十年的风雨,十年的收获,十年的成就。老一辈的考古学家和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用辛勤的汗水和劳动,把沧桑的遗址变为世人瞩目的文化遗产,其辛之艰,其劳之大,共功之伟,历史将永远铭刻。

主编宋大川策划了本书的选题,审阅了本书的全稿,指导作者对书稿进行了修改。副主编朱志刚负责本书的组织、协调、联系和编务工作。《海淀卷》由郭力展执笔,《延庆卷》由尚珩执笔,《密云、怀柔、昌平卷》由郭力展和尚珩执笔,《南水北调卷》由王清林执笔,《朝阳卷》由朱志刚执笔,《建筑遗址卷》由黄娟、刘锐执笔,《城区卷》由李华、李贝执笔,《奥运卷》由杨菊执笔,《房山、丰台、门头沟、石景山卷》由韩鸿业执笔,《大兴卷》由刘乃涛执笔,《亦庄卷》由董育纲、刘乃涛执笔,《平谷、通州、顺义卷》由刘风亮执笔。

考古工作是一项艰辛的工作,考古学者无疑是经历人生艰辛最多的一类学者,他们风餐露宿,跋山涉水,锲而不舍,苦苦求索,走上了一条艰辛而又漫长的探索之路。每一项学术研究成果,都包含了他们艰苦细致的工作。当我们回顾北京十年来的考古研究成就时,我们不能忘记每一位考古工作者所付出的辛劳。“学思启罔”已成为北京考古人的座右铭,让我们加倍努力工作,使北京的历史文化积淀与现代化城市的发展相得益彰。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鉴往知今,可以昭示未来。回顾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事业十年来的辉煌历程,北京的考古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推动文化遗产事业科学发展新的征程上,勇于承担自己的崇高使命,为建设“人文北京”做出了新的贡献。我们的工作无愧于时代,我们的创造无愧于历史,我们的学术研究无愧于未来!

宋大川

二〇一一年三月



亦庄卷考古工作分布示意图

概 述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也称亦庄开发区,位于北京市东南方向的朝阳区、通州区、大兴区三区交界处,大兴区亦庄镇东南,由经济技术开发区、协作配套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三个区域组成,是北京市唯一同时享受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双重优惠政策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亦庄开发区内凉水河自西北向东南流过,支流新凤河自西南向东北流入凉水河。凉水河曾在北京城的建城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古称洗马沟、桑乾水、莲花河。新凤河南侧为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凉水河东北侧为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南侧为协作配套区。

随着亦庄开发区建设的飞速发展,配合建设的考古工作全面铺开。在亦庄开发区的基本建设过程中,为避免地下文物遭到破坏,做好地下文物保护工作,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开发区进行了考古勘探、发掘以及文物保护工作。

《北京考古工作报告·亦庄卷》收录了自2000年至2009年十年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亦庄开发区所做的考古勘探及发掘工作。

十年来,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高度重视地下文物保护工作,北京市文物局及市属各委办局通力协作,积极支持考古发掘工作,各建设单位对地下文物保护工作的观念和理解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亦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及各相关部门的配合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开发区各建设单位占地范围内和开发区内的规划地块进行了调查和勘探,查明地下古代遗存的埋藏和分布情况,并对古代遗存进行了科学细致的考古发掘工作。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亦庄开发区完成地下文物勘探工作20余项,勘探总面积1 810 000余平方米,完成发掘工作20余项,发掘面积12 000余平方米,发掘各历史时期墓葬500余座,窑址10余座,出土器物900余件(套),墓葬年代自战国开始,历经汉、唐、辽、金、明、清,涵盖七个时代。

十年来,北京的考古工作者在艰难的条件下,在亦庄开发区取得了一系列令人世人瞩目的成果。这些被保护下来的历史文化遗存,承载着城市的历史信息,是城市的历史记忆。可以说,它是北京的文脉和灵魂,起着标识城市历史、诠释城市发展进程的作用。这些成果主要有康定街,西环南路,兴业街,新凤河路,经海路,泽通水务泰和三街,兴海路,博兴路,兴海二街,博兴七路综合市政工程,经济技术开发区69号地、79号地、80号地、81

号地,中德合资奔驰公司占地范围内的 X33、X41、X42、X49 号地,南部新区 X62 地块,博世力士乐液压有限公司,鹿圈拆迁安置工程,卡达克汽车检测技术中心,第八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项目等工程项目古墓葬及遗址的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工作。

亦庄开发区的建设和文物保护的关系非常密切,建设和文物保护都是为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长远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做好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意义重大。北京现在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必须高度重视它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它的历史文化内涵。亦庄开发区的文物保护工作,既保证了开发区规划建设的顺利进行,又保护了地下文物的安全,并获取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对研究亦庄地区的历史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

考古工作是一项艰辛的工作,考古学者无疑是经历人生艰辛最多的一类学者,他们苦苦求索,锲而不舍,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走上了一条艰辛而又漫长的探索之路。每一项考古发现,都包含了他们艰苦细致的工作。当我们回顾亦庄开发区十年来的考古成就时,我们不能忘记每一位考古工作者的艰辛工作。

“学思启罔”已成为北京考古人的座右铭,让我们加倍努力,让北京的历史沉淀与现代化发展相得益彰。

《北京考古工作报告·亦庄卷》的整理工作由董育纲、刘乃涛执笔。

《北京考古工作报告·亦庄卷》的出版,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集体智慧的结晶,凡是参加过北京地区文物的发掘及保护工作的同志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勘探和发掘过程中,基建考古室、考古研究室、技术保护室、文献研究室、办公室、行保科的各位同仁做了大量的工作,本书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集体劳动的成果。

董育纲 刘乃涛 执笔

二〇一一年三月